



# 目 录

## 古城·古村寨

右甸古城 .....	李汉础/003
德斯里 .....	李明华/009
湾甸大城 .....	李明华/017
铁匠寨 .....	李明华/023
千年古村——董瓮 .....	杨荟能/029
鲁家大院 .....	罗金荣/041
潯水大竹林 .....	辉丽琴/053
潯水徐家寨 .....	辉丽琴/057
老街子 .....	李明华 蒋光舜/062
广邑寨 .....	李明华/064
勐廷寨 .....	杨荟能/068
大扁里 .....	李明华/081
打平 .....	杨军 曾效智 李明华/084
竹鲁洼 .....	蒋光舜/089
里睦 .....	罗金荣/091
大田坝华严 .....	蒋光舜/104
大田坝阿便寨 .....	蒋光舜/111
撒马场 .....	罗金荣/113
湾甸帕旭和帕旭缅寺 .....	辉丽琴/135
湾甸马棒 .....	辉丽琴/137
湾甸芒回 .....	辉丽琴/140
湾甸城子 .....	辉丽琴/145
千古江楼 .....	辉丽琴 高华山/149

营盘山——昌宁三千年文明的活字典 .....	罗金荣/156
泇勺村寨和泇勺佛寺 .....	辉丽琴/181
大石头街 .....	辉丽琴/185
大田坝新寨 .....	段光九/190
宝丰 .....	李明华/193
风雨老街 .....	杨军 禹忠何/196

### 古建筑·古桥

毛寨赵家老屋 .....	李明华/203
潐水明德大河坝锁水阁 .....	辉丽琴 周国永/208
昌宁右甸坝文笔塔 .....	张赛茹/211
长顺石桥 .....	刘冰/215
安澜桥 .....	李明华/218
潐水永盛桥 .....	辉丽琴/220
湾甸大花桥 .....	辉丽琴/222
田园镇辉家寨桥 .....	辉丽琴/225
枯柯大桥话今昔 .....	张赛茹/228

### 古寺庙

白坟三圣宫 .....	杨荟能/235
潐水河尾东山寺 .....	张赛茹/246
德禄三圣宫 .....	杨荟能/252
卡斯云岩寺 .....	辉丽琴/258
大田坝宝华寺 .....	山子/262
碧云寺 .....	陈明/264
青灵寺 .....	陈明/266
龙潭寺 .....	陈明/268
右甸关庙 .....	陈明/271





### 古渡·古道遗址

荣星古生物化石群 .....	杨军	禹忠何/275
澜沧江畔最后的古道 .....	杨军	禹忠何/277
珠街古渡 .....	杨军	/280
竹洼古渡 .....	杨建赋	/285
武侯石柱 .....	山子	/288
湾甸大石城遗址 .....	辉丽琴	/290
勐统坛子窑 .....	杨建赋	王富芳/293
右甸龙津书院 .....	陈明	/296

### 陵园·碑记

姚家坡烈士陵园 .....	张赛茹	/301
卡斯兰山烈士墓 .....	张赛茹	/309
甘棠遗爱碑 .....	王润民	/314
《圣殿碑记》览 .....	孟志武	/316
回龙（珠山）寺常住碑初考 .....	李发祥	/325
都鲁凹甲纪略碑 .....	陈明	/330



## 《昌宁文化地图》序

黄 尧

昌宁县编撰的《昌宁文化地图》即将付梓，邀我为序。

所谓“文化地图”，是新近创出的一个名词。“文化”所以为“地图”者，大约文化，尤指地域文化自滥觞而涓涓，或隐秘或彰显，或湮没或汇流，都有其渊源、走向，追根溯源，自然会勾勒出一幅趋近完整的“地图”；而“地图”所以为“文化”者，也大约因为世界文明，尤其是新大陆文明，都以地理发现为前端，进而引发明大发现，诸多原住民古老文明因此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许多地域文化元素一再为人类追寻自身缘起提供了惊世骇俗、足以改写前史的证明。使一个倨傲于现代文明的社会顿时进入羞惭的追省与反思。地理与文化是土壤及造物的关系，外来文化无不因地理生存因素而变异。因此，地理发现与文化发现或以地理定位的文化钩沉探幽，随着人类科技手段的进步，一直是自19世纪始，人类乐此不疲的事业。21世纪，人类自身困扰加剧，这种种发现显示出来的启迪意义愈显重大。云南，处于南亚、东南亚的十字路口，这个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兴起的地球最壮丽的伟力展示，留下了极其雄浑的山水诗篇，风云画卷。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云南原生态文明得以部分存留，而大凡中土文明之种质，一经沉淀，也很难为世变所洗磨，于是，这块最古老也最年轻的大陆，呈现出无与伦比的丰富和多元文化杂濡糅合的状态，大约如此，云南，一直处于人类的“发现”与“再发现”之中。无论是中国古代中央文明对云南的“发现”，还是近代的“殖民发现”，都远未尽其奥妙奇美。今天，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价值体系为指导的“发现”，是继前两个阶段之后更

重要的“发现”，《昌宁文化地图》是这一主题下的创作，具有现代先进文明的眼光及高度。

我对保山地区有一定的了解，其远可直追40年前。惟对其辖下之昌宁，多次因故爽其诚邀，至今无缘踏访。我也无意中成了这份“地图”最少偏见、最多笃诚的读者。

《昌宁文化地图》是一部文化散文荟萃，并不袭用地方史志及风物志的编撰分类方法，也有别于时下时兴的抒情性“大散文”，从结构布局看，它比较重视客观的人文实证。一城一镇一村一寨一宅，古渡古津古道古庙古寺，大凡有着人文历史印迹，都一一细加钩沉考证，旁征博引，又与现实参阅对照，自然也引发史思宏论。虽未单立“人物”一目，但诸如抗日名将鲁道源者，其家世事迹，是尽其自然而融入各个相关篇章。这一编著风格，依我之陋见，在大行“盛世修史”的今天，是具有独创品格的。

以编目之首部“古城、古村镇”为例，虽各篇书写风格有异，也大多遵从上述宗旨。有着三千年以上文明史的昌宁，是自汉代以来，“永昌文化带”上一颗明珠，兹后历史演变，由“永昌”取“昌”，“顺宁”取“宁”而得“昌宁”。这种“移借”，在中国地名史中虽不属仅见，但至少说明昌宁在滇西一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及地理的特殊地位。17世纪至19世纪末，是中国封建文化从兴盛走向衰亡的时期，作为数千年封建文明的基石的农耕文明，包括由这一基础产生的陆路经济，正在为更先进的海洋文明和渐次侵袭的殖民、半殖民经济所动摇代替。所谓“耕读传家”实在是这衰微中的夕阳残照。但正是这一抹瞬时即逝的光辉，在昌宁，在我边远的南滇，产生了一种辉耀中国近代史的光彩，迅速孕育了一批雄奇挺秀的精英子弟，辛亥、护国——滇军兴起，赖于此辈，继后抗日，恶战死搏，血肉长城竟起于沧澜山水，这实在是历史的绝笔！昌宁鲁道源携其乡亲子弟共赴疆场，以尸骨还乡，末了日倭伏败，将军于南昌举行受降仪式接受日军投降。史笔落墨惊风！《昌宁文化地图》皆以散点透视之法真实记录还原了历史脉络之种种，是令人顿生快感的“导读”。

《昌宁文化地图》全编笔墨生动、真切、自然而不假饰作，这一朴实而不失美文气度的文风，也尤可嘉赞。





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能以其深思精虑，谋划运作，绘制了这样一部内容十分厚重，具有史学、文学、社会学多种价值的“地图”，除了地方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所有编著者投入其中的心血之巨大，是完全能够想象的。作为一个读者，我由衷表示钦佩。我还想到，《昌宁文化地图》提供的样式，各地尽可参照其精髓，但没有对那一方水土人民的至诚之爱和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高度责任感，恐怕亦难成事。昌宁的作家、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完成此举后，是否仍能精进不辍，我当然期待的是一番文化旅者始终梦求的欣喜。

序毕。

2007年12月20日

注：黄尧，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 营盘山——昌宁三千年 文明的活字典.....罗金荣

## 一、文明的摇篮

满坝谷子黄成金，满坝故事讲不赢……

——营盘山民谣

营盘山，昌宁右甸坝文明的摇篮。这里有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名扬中外的青铜文化——出土的炭化水稻是云南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址，人面纹大弯刀，在全国独一无二。它是右甸坝最早居住人类的地方，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翻开了右甸坝人类历史的纪元，从此在这苍苍穹庐之下茫茫厚土之中，我们像一粒优秀的种子，生长在这块土地，开成花，结出果，人类的文明从此像右甸河哺育着这方大地。它又是军事战略要地，自古以来战争像蟒像蛇一样缠绕着这方红土，是攻守右甸坝南面的重要咽喉，“血洗十三寨”在这里进行屠戮，“红白旗事件”在这里血腥厮杀。是研究云南古代哀牢文化、明朝百万汉民入滇文化、杜文秀起义文化、民间传统文化以及“文革”历史前后的土壤，几乎囊括了昌宁上下3000年或悲壮或惨淡或雄浑的历史。关于巨蟒的传说、白虎的传说、白狐的传说、成精黄鳝的传说、马尾狼的传说……还有飘来飘去的仙女……使之充满了神秘与魔幻，如右甸坝的晨雾在天地交汇处给美丽的





山山水水秀峰奇崖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萦绕千年。营盘山曾像女娲突兀的乳房养育了我们。

## 二、璀璨的新石器文化

地下石头天上星，颗颗石头亮晶晶……

——营盘山民谣

营盘山充满了迷雾，许多历史寂静又遥远地停泊于黑暗的潮头——这里的地宫住满了小鬼，他们能把无数的石头变成刀子割下小孩的舌头，掏出人的心肝，挖出人的眼珠……这里的森林里居住着修行千年的白狐，是万载不灭的灵魂，她们貌若天仙、肌若琼浆、肤若白雪、芳若香草，来如水出轻波、走如牡丹吐艳、爱若秋水倾天，天地在这里完美升华。她们常和路过的书生发生爱情，许多陶罐和石器其实是金子是珍珠是她们的嫁奁，在浪漫的爱情故事中，谁得到了就能高中状元甚至长生不老。据祖上流传，我的祖先就曾在这里和白狐有了一段姻缘，到顺宁府里做了大官，后来到了天宫做了天官……营盘山啊爱情的海市蜃楼！

营盘山用薄薄的石刀剖开了右甸坝的人类文明。1957年，随着国务院有关专家的到来，保山填补了史前考古的空白，1981年保山全面、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昌宁的文物考古进入了新的黄金时期，营盘山天荒地老的历史终于揭开了千年之谜——它是3000多年前人类的一个新石器遗址，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营盘山的上古文化如千年的仙女终于飘洒出美丽的风采。

昌宁新石器文化，1990年《昌宁县志》指出：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和陶片，表明距今3500—4000年前，境内就有人活动。在新石器遗址的分类中，营盘山属于河湖台地形，即原始居民或许生活在半封闭的湖盆边缘，湖盆后来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和河流切割，现已干涸成为盆地，或是堆积的台地，坐落于分水岭两则，新石器文化已比洞穴型和岩厦型进步。3000多年前这里的一块块石头，长上了翅膀，变成苍劲的雄鹰，翱翔于红土大高原，成为当时人类最美的风景。1990年3月，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文物工作者对营盘山新石器遗址进行了正规的发掘，掘出

房屋一栋四间，炭化稻米七公斤，单孔石刀一把，石刀锥坯四件，砾石片刮削器一件，平磨面凹磨面砺石一件，粗细绳纹夹沙黑陶、红陶片多件，石斧等。人们再次嗅到了上古时代人类最初的信息。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参悟到上古，一个精彩的世界便出现在眼前：几间草屋，穿着树叶或兽皮的族群，她们偶尔露出大朵大朵的乳房和大朵大朵的臀，乳房水灵灵、鼓胀胀，结结实实的乳房上孩子又像结出的瓜果，她们的奶水除了奶孩子还可以奶大几只小狗小猫；他们在飞舞的蝴蝶里或高举着石器照亮了天空，或用草绳编制成原始陶器的模样再把泥土依附在草绳内，简单烧制后，就形成了绳纹的陶器，他们猎回了虎、豹，采回了野生的稻籽，或用木器，或用石器在周围耕耘，每当夜晚炊烟袅袅，人们的笑语如兽，哪个男子最勇猛就可以得到族群里最漂亮的女人。直到有一天，一场大火烧去了草屋，也把储存的稻籽烧成了炭。也许这群祖先经过了青铜文化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没有生存下来，他们脆薄的生命犹如手中的陶器；也许迁徙到了别的地方，但他们的新石器文化已如一轮明月照亮了一方天地。

昌宁共有新石器出土点8处，说明3000多年前这些地方有人类活动。其中对营盘山进行了正规的发掘，营盘山在新石器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石器文明如微风过山，开放了石头的花朵，和天上的星星对应。营盘山出土的新石器现在收藏于昌宁县文管所，属于平刃有肩斧，其特点是用砾岩细沙石制作，器形扁平，肩部呈直角状，刃端平略呈斜坡形。如一种无声的语言向我们诉说着远古。

营盘山出土的房屋为干栏式建筑，即楼下豢养捕到的兽，后来关养家畜，楼上居住人类，符合南方常年多雨地面潮湿楼上干燥的特点。《保山史前考古》一书载：“粤桂滇等省区作为古代干栏式建筑的主要分布区，木作工艺要求比较高，为……石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此类文化的创造者，学术界公认为百越先民，其共同特征除以磨制双肩石器为最典型的代表物和住干栏式房屋外，还包括拍印绳纹的夹沙或夹炭粗陶……昌宁西部属滇越先民的原始文化……”分布于云南的百越族群，其后发展为汉藏语系侗傣语族中的傣、黎、壮等民族。在昌宁境内，百越文化在柯街亦有出土：1993年3月，马桑林洼李国文在小岭岗挖房屋地基时，掘出铲形有肩石斧四件。《保山史前考古》一书指出：“昌宁柯





街所出磨光有肩石斧，原属东南沿海和港、台、江西最富有特征的器物……说明新石器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古文化的影响。”营盘山的这种居住文化在这块土地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影响了各民族，如今的乡村，在深山壑谷中仍是这种质朴的民居。

营盘山出土的文物，石斧在肩上装有木柄，用于用力砍伐树木等，平磨面凹磨面砺石的出土，证明古代的居民已开始了石器的磨制，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多件陶器的出土，它已用于生产和生活的领域，如储藏、盛物、运载，单孔石刀的出现，已开始了收割等，大量的炭化稻出土，证明这里已开始了稳定的农业种植，人们已从食物采集阶段进入食物生产阶段，出现了农业文明。稻花的清香已弥漫这方古老的土地，农耕文化从此成为一条长河，横亘在右甸文明的上空。

右甸坝自古以来是昌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右甸坝出土的新石器共有两处，除营盘山外，1985年11月，在右甸坝西部的姚家坡挖基槽时，掘出石箭镞两件，石铲一件，为百濮文化的痕迹，百濮族群，其后来发展成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中的布朗、佯、德昂等民族，说明远在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右甸坝境内就有百越族群居住、活动，营盘山是右甸、昌宁文明的摇篮。

新石器晚期，祖国境内出现了四个比较大的民族群体：百越、百濮、氐羌、三苗。由于西北、中原、沿海一带异族强大力量的迅速崛起和蔓延，属于百越的部落群体，主要活动于钱塘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带被迫向西南南部的地区迁徙；氐羌主要活动在西部大部分地区，后被迫向澜沧江、金沙江等河流南迁。百濮即孟高棉的部落群体，主要活动在西南地区；三苗主要活动于黄河、长江中下游。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部落就是新石器晚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夏、商、周时期，地域比较接近的氐羌、百越、三苗中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后，这些逐渐融合的部分，到汉朝形成了汉族。昌宁境内最初的土著民族为百濮，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末，由于大量异族涌入，在民族的争夺中被迫迁徙到中印半岛去了。营盘山出土的史前文化基本同中华文化吻合。很显然，在新石器时期，昌宁境内已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地区特点，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昌宁境内的原始群体，有的与西北和

中原的群体关系密切，有的与东南沿海的原始民族关系亲近，有的属于孟高棉文化部落。多种文化横岭侧峰、远近高低、沧海桑田，形成了多彩的昌宁史前文化。

在昌宁营盘山出土的新石器遗存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遗物痕迹，著名学者、考古学家耿德铭在《哀牢国与哀牢文化》一书载：“所见房屋形式、结构不同于外地……营盘山是半地穴式长方形榫卯梁椽两面坡草顶屋……”

该书还指出：“营盘山炭化稻米是云南省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古稻遗存……表明有悠久的稻作史……”营盘山的新石器文化是云南古代人类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 三、举目的青铜文化

金坝子、银坝子，地下到处是雷楔子……

——营盘山民谣

昌宁有灿烂的青铜文化。1988年文化部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指出：“西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分布范围主要在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洱海地区青铜器出土地点有剑川、祥云、大理、楚雄、元谋、姚安、永胜、宁蒗、巍山、昌宁等县市。”昌宁先后出土的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大量青铜器，展示了2100年前，境内先民从事农业、牧业、狩猎、桑蚕、娱乐和战争的场景。千年的遗迹，向我们诠释着史料中的空白，祖先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我们交谈。

1987年3月，营盘山居民在挖地埂时挖出了人面纹大弯刀两把，出土时两刀交叠放置。人面纹大弯刀的出土，令云南考古界震惊。沾满尘垢的语言，虽然锈迹斑斑，却使云南的青铜文化陡增天色。

1985年，当地居民在耕犁时，犁出铜锄一把，这文明的骸骨，在云南青铜文化中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营盘山出土的人面纹大弯刀，是当地先民使用的一种独特器物，在全国青铜器中独一无二。营盘山出土的人面纹大弯刀有三大特点：一是形体较大，长、宽分别达55.5厘米和7厘米；二是刃面呈弯钩形，刃后部





肥阔而向前渐窄，刀顶端呈平齐状，有刃无锋尖，成为“平头刀”；三是倒梯形釜（安柄的孔）面上有人面纹饰，人面纹和釜口之间有弦纹夹短纵线束的横纹带。铜色紫红，为战国早、中期制品。

人面纹大弯刀类似梯田“砍埂刀”和傣族的一种弯镰，但釜面图案却似中原的钺首之形，因此也有可能是砍杀武器或刑具。由此可推知昌宁的青铜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此时昌宁右甸境内可能出现了战争或酷刑，甚至进入了阶级社会。《中国青铜器》一书指出：“中国青铜器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过了15个世纪，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战国时代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使得青铜的铸造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从昌宁出土人面纹大弯刀等来看，昌宁古代的文明和中华的文明是同步的。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地球的地面可采的自然铜很少，青铜的大量铸造必须依靠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中国的铜矿资源，是商周铸造业发展的基础。昌宁境内富含铜、锡和铅，从人面纹大弯刀仅见于此，在全国独一无二来看，昌宁境内已有了青铜铸造业。昌宁曲折折的历史有了铜一般的韧性而迅速发展。

人面纹大弯刀工艺相对粗糙，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丛书《青铜器·瓷器》一书载的内容：“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确立期，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变化和新工艺的产生反映了封建制度初步确立后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一个侧面，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器具加速制造，不免粗糙。”青铜器的纹饰是在新石器时期陶器花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纹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人们的审美意识。青铜器的纹饰最初多为动物，自然界风、云、雷、电等图腾，是巫师通天的工具，是人们对天的膜拜，是大自然一种神秘、威严的象征；但春秋至战国年代，奴隶制度的土崩瓦解，这一时期人们思想活跃，封建制形成时期思想领域轻天重人的思想发展，纹饰中人物占了主导地位。此期青铜纹饰的发展，为汉代画像及装饰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昌宁人面纹大弯刀中的人纹图案出现，说明当时昌宁重民重人的思想已经形成，在神性力量中已出现了人性力量，封建思想已经萌芽，盲冥之目再次睁开。

在青铜文化中，刀，泛指用于切、割、砍、削、斩、铡的利器，分属军用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三类；中原商周遗存中发现较多，云南剑川海门口、德钦永芝等处曾出土多件，大都刀体长匀，长10—40厘米，刃平面是长条锥尖形或长条翅尖形，多为素面，少有雷纹或兽面纹。所以昌宁的人面纹大弯刀文化符号极强，具有典型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代表性，图片在《哀牢国与哀牢文化》等书中，作为典型文化被作为封面或封底，深受国内外关注。

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中，是否使用青铜农具的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有争论。由于田野发掘工作中所发现的商周青铜农具比较少，而石制农具比较多，于是有人提出中国的奴隶制度无青铜农具，包括郭沫若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在《奴隶时代》一文指出“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如果按照中国奴隶制时代无青铜农具，只有石器、木器的说法，势必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古代农业生产工具是由石器直接转入铁器的，中间没有使用青铜的阶段。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物质标志，如果没有青铜农具时代，只有加工较为艰难和脆性极大的石器，那么中国的奴隶社会就不会出现高度的农业文明，成为后来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作为一个昌宁文化的长期研究者和探寻者，笔者持这样的观点，即目前发现青铜农具稀少是由于青铜的珍贵，用旧了的青铜可以改铸，不可能随便遗弃，而且青铜的加工较为简单；农具和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工具不一样，由于奴隶时代对体力劳动的鄙视，它一般不作为陪葬品，因而青铜农具的遗存必然是极少的，不像大量用于显示身份的铜鼓、兵器、饰物等。研究古代文化，虽然每一件实物都是最有说服力的文化符号与信号，但我们又不能孤立地研究这些实物，否则就会陷入重实物轻历史的泥潭不能自拔。我们只有运用已有的知识对历史抽绎之、结构之、左右之，我们的思想才会到遥远但可及的境地，接近真理。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青铜器·瓷器》一书还指出：“锄，是古代除草疏苗用的农具……现出土的青铜锄很少，大都是汉代的。”营盘山青铜锄的出土，成为中国奴隶时代使用青铜农具的重要佐证之一，并且说明当时昌宁境内生产力达到了较高水平，和在这里发现云南最早古稻遗存是相辅相成的。





## 四、回族和军事文化

清官清到底，要钱不要米；要米背不动，要钱好装起……

——营盘山民谣

回族文化是昌宁文化的重要部分，研究昌宁的回族和昌宁军事文化不能不到营盘山。昌宁的回族文化是云南回族文化的一部分。

回族不是中国境内某个民族、部落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基本上是域外域内多种民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逐渐融合而成的。回族文化的特点植根于700多年以来回民族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社会状况之中，近年来对回族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已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其中，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自然成为核心内容。由于云南的多民族性，云南的回族文化被赋予了更多内容，回族宗教生活的禁忌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差异，最终体现了一种文化习俗的冲突（《云南回族文化史》）。清朝末年，腐朽的清王朝在云南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不惜使用卑劣手段，挑拨民族关系，直至云南各民族识破了清廷面目，民族争斗最终转化为反对朝廷的斗争，为后来云南“重九起义”推翻清廷奠定了基础，研究云南回族文化对研究云南近代史，云南在推翻两千多年中国帝制中成为最早起义省份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站在营盘山的白虎山嘴子，右甸坝的南面尽收眼底。自古以来，它是右甸坝南方的咽喉要冲，被称为右甸坝的“南阳关”。“红白旗事件”中，这里驻了大量的回族义军，故称营盘山。

右甸坝西部的姚家坡石箭镞出土，说明在古代右甸坝就存在狩猎文化或军事文化，如果营盘山出土的人面纹大弯刀属于厮杀的兵器，那么说明在青铜时代，这里就存在战争。

昌宁有明确记录的杀戮有“血洗十三寨”。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载：“云南十三寨诸夷。虽名十三寨，高山深壑，绵亘数百里，即百寨不止也。所居天险，强弩毒药，为诸夷之最。董瓮（今昌宁董瓮）、亦革维（今昌宁卡斯一带）、亦壁（今昌宁和睦寨）等寨诸夷莽四、歪列、哈刺梗（均为夷民首领）等遂联结为乱，杀指挥，千（户）百

(户)等官兵数十人。……且言，胜则据顺蒙（今凤庆、昌宁、巍山）固腾永（今腾冲、保山），败则西勾緬。”为此“上震怒，决计讨之，假抚镇臣，便宜行事”。

《昌宁县志》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朝廷调集腾越（今腾冲）、姚关、顺宁、蒙化等地官兵约两万人，分别从右甸、湾甸及澜沧路之富都、牛街等地分道夹攻董瓮、潞水等寨，斩杀十三寨夷民。经过半年多的围剿，首领蛮四等及夷民九百余人被斩。随后，兵部上奏朝廷邀功称：兵不过两万，期不过七月，擒斩计一千八百八十七名，降附安插至一万二百六十有奇，视先年丁改之役，不啻过之。”

十三寨，是明朝时对北起潞水、董瓮，南至凤庆勐佑一带的统称。相传营盘山曾尸首成山，血流成河。如今站在营盘山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右甸坝战马嘶嘶、旌旗蔽日，犀利的刀锋、骇人的寒光……明晃晃的刀刺人时像刺进牛或羊的喉咙里……血雾如蒸、映日映月……尸首如柴……我看到了流动的血停在刀锋上，凝固成一颗又一颗的血珠后飘成了彩云。营盘山及右甸坝真正成了屠宰场。

2007年6月的一天，我到当地采访现已80岁的段应昌等老人，他们最能说出的这里有驻军和残酷杀戮的是“红白旗事件”。清道光年间，右甸狼烟四起，再遭兵祸，历时数十年。此次战乱民间称“红白旗乱”，又称“杜文秀起义”。

咸丰六年（1856年），保山金鸡村回民杜文秀呼应太平天国，率众起义，锋芒直指腐朽的清王朝，在大理建立政权后任兵马大元帅，十余年间攻克滇西53州县，粉碎了清王朝6次大进攻。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太平天国失败后，清王朝攻破大理城，以献出杜文秀为免于屠城条件，杜文秀服下孔雀胆后慷慨赴敌营。言而无信的清王朝在杜文秀牺牲后仍疯狂屠城，殷红的血水使大理的护城河三月未清。史载：“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云南回族几乎面临全族覆灭的绝境，大理城破后清军屠城三日，附近的回族村庄多被夷为平地；蒙化、腾冲、云县等地的回族村庄惨遭屠杀，幸存者无几。”杜文秀罹难后的一年，义军在大司空李国伦统率下顽强战斗。

“红白旗事件”《昌宁县志》作了以下记述：“在清道光至同治年间爆发的回民起义中，因起义军拥白旗，官府军拥红旗，故本县民间俗称





这次起义为‘红白旗事件’。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四月，永昌回民响应杜文秀起义进攻金鸡村失败后，大部逃往江外。七月，起义回民聚集境内勐廷寨，攻思母车（今柯街鱼塘寨）、枯柯、大田坝、丙麻等地。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官军奉上御：‘惟回众甫经上年剿办之后，复敢借端寻衅，彼猖已极……若不乘机扑灭，必至勾结为患。……总期立时殄灭，早靖边陲，是为至要……’于是，汇集提臣张必禄、总兵音德布、署迤西周澍、署永昌府黄德濂，派往顺宁的护开化镇李能臣以及昭通镇刘定远等各路官兵，四周围剿。护开化镇李能臣一路，于四月十九日抵右甸，派游击安如嵩、署都司李凤山及署守备潘腾龙等连开枪炮，打死回民首领并起义群众百余。当回民冲向威远兵营盘时，又遭到游击张文焕轰击，死伤六七十人，并有赵扛扛、马老八、金支联、马有贵等13人被俘。二十七日，当一股起义回民逃往明益里四甲时，又被兵练截杀殆尽。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大麦地与右甸两路官兵会合进逼勐廷寨。五月初六，百余回民逃至达丙桥边，突遭兵练追杀，除田禄一人被俘外，‘余尽杀毙’。初九，勐廷寨清真寺突然起火，回民六七百人分两路逃出。逃往新寨一股，被总兵音德布土把总左大雄率同练头围攻，‘枪箭叠发，立即歼餐’；逃往达丙一股也遭民练截杀，马二、沙鸿元、马万贵等三人被擒，其余逃往四面山岭。起义回民先后于乌鸦河（今新华石佛山一带）

将奉命前来围剿的官军首领韦成喜、守备严方训、把总解彪、金鳌等杀毙。初十，提臣再次派官兵到勐廷寨及其附近搜拿回民，又抓获两人。直至官兵禀称‘并无伏贼’，才一面论功升赏，一面继续派总兵音德布，在右甸通往大理府的必由之路严密封堵。”

《昌宁县志》对“红白旗事件”的叙述至少有两处不够准确。



◎ 人面纹大弯刀、钺（张绍全摄）

其一，昌宁境内的回民具有光辉的历史，勐廷在道光年间就是回族反清的发祥地，昌宁境内的反清起义早于杜文秀之前，开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而杜文秀起义开始于咸丰六年（1856年），二者相差11年，并非完全响应杜文秀起义。

《杜文秀秘录》载：“清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七日，勐廷回民首领桑道三率回民千余人，经枯柯河，驻永昌丙麻，百姓歌谣：桑道三来桑道三，驻在丙麻大营盘，官兵见了打摆子，百姓见了喜洋洋。……回民洪水般涌出，痛歼猛杀，无几时，尸横遍野……官兵死者大半，敌军潘、杨二将被俘……道光二十六年，桑道三率部返回勐廷，对峙，官兵数十次攻打，众回坚守不失，后有蒙化（今巍山）、曲洞、旧州（今云县）、漕涧、缅宁（今临沧）来众支援，官兵大溃而逃，道光二十六年腊月初十，正式成立回民反满军，公推桑道三为首领，转战各地，主支留守勐廷……”《云南回族文化史》（纳文汇、马兴东著）一书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发生‘缅宁惨案’（今临沧），被杀的无辜回民有三千多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永昌惨案’仅一夜之间，当地回民老幼被杀‘一千三百余户’计八千余丁口。”《云南民族史》（尤中著）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永昌知府恒文指使保山县的汉族地霸沈聚成、张时重等，在保山城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杀回，回民被杀四千多（杜文秀在汉族同胞的掩护下始得逃脱——笔者补），恒文的爪牙黄贵，更是趁火打劫，掳了回民杜文秀的妻子（应是未婚妻马小有——笔者补），迤西各地的回民便普遍起来进行反抗。”《永昌文化史》载：“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六年的七年间，就发生了不同规模的回汉械斗事件10起，影响较大的有，一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四月，回汉青年在今城北板桥唱山歌——由玩唱变为辱唱，最后导致较大规模的回汉械斗流血事件，回民伤亡230户，1340人；汉族伤亡230户，1100人。二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八月，今昌宁勐廷寨回民桑道三，率回民460余人揭竿而起，一举攻占永昌丙麻，走上抗击官兵的道路；次年，他在勐廷寨宣布成立‘回民反满军’，并被公推为首领，坚持反清斗争。”

其二，由于杜文秀起义军使用白旗，以云南巡抚岑毓亲自督战的官兵使用红旗，所以云南大部分地方民间都把这次起义称“红白旗事件”或“红白旗乱”，而并非昌宁县境内。

